

文章编号:1674-8107(2016)02-0099-09

论后现代视阈下的文学理论场域

——关于推进文学理论涵义研究的讨论

赵建军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5)

摘 要: 后现代视阈下的文学理论场域,凸显出一种对传统视界理论话语的突破。借助理论涵义的突破与新媒介的合谋,文学理论实现了整体话语形态的颠覆。首先,文学理论的意识形态化阐释,在体现当代人性本真与现实性统一的场域方面,完成了话语增殖。其次,在非意识形态的文学理论场域方面,通过“图像理论”、“叙事理论”、“意象理论”等的探索掘进,促成中国文学理论的本质、构成蕴涵的相应转换。总之,后现代视阈下的文学理论场域针对现代性的理论症候,向后现代涵义的文学理论研究转换,这种转换注重宏观逻辑与文学自身话语身份的研究,注重文学理论的涵义研究,将深化和推动中国文学理论的未来发展。

关键词: 后现代视阈;文学理论;涵义

中图分类号: I207.9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8107.2016.02.016

后现代的理论和文化,对中国文学理论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主要体现为理论视阈上的吸收和借鉴。后现代视阈下的文学理论研究,由于后现代视阈的引入,而促发理论场域发生权柄的转换,它不仅与现代性视阈下对“差异性、矛盾性和内在冲突”^{[1](P42)}的理论探讨形成区别,而且更重视透过话语的“解构”意愿凸显文学本身的存在,因而具有特别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理论场域的悖离:颠覆是否成立?

文学理论场域在近二十年的研究中,有没有与传统理论视界及其话语平台拉开距离,甚至是悖离,这是考察文学理论场域推进与否的一个前提。所谓场域,根据上世纪由现象学发端,接受美学导入读者视为视界及后现代辐射状的多学科理论涵义交融,当指文学对其内在蕴涵的逻辑包孕,即在何种意义上,文学的逻辑指涉了真正属于其内在构成的、并与其他学科的话语形成交互推进的蕴涵机制。假定文学理论的场域发生了根本性

的转换,那么它首先所针对的就是传统文学理论,通过对传统文学理论的实质性悖离,实现文学理论蕴涵的颠覆性推进。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文学理论场域的主导观念是意识形态性的,这种理论场域的逻辑模式,体现为康德式的“先在性”(piori)综合预设,即将理论直觉纳入先在性知识——一种先验逻辑(transcendental logic)之中^{[2](P18)}。诚然,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学理论蕴涵的来源可以是多方面的,既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一般描述,也有基于文学直觉的体验与分析,如关于“审美性”和“文学言语”的话语阐释。但在后现代视阈下,这些都逐渐地向一种新的生存模态转换。对此,有学者这样概括说:“后现代时代是一个感性肉身的时代,是个强调肉身安顿大于精神安顿的时代,是一个图像符号取代文字文学的时代,是一个读图时代大于读文时代的图像学世纪。”^{[3](P129)}又有学者总结说:“文学遭遇‘图像时代’的问题是当下学界十分关切的问题,也是学术热点之一,特别是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中,早已被翻炒得炙手可热。”^{[4](P183)}对文

收稿日期:2015-11-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古后期佛教般若美学范畴与美学流变”(项目编号:13BZW014)。

作者简介:赵建军(1958-),男,内蒙古临河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美学史和文艺理论研究。

学遭遇“图像时代”的描述,反映了后现代视阈对文学存在境况的省思,但这种反思仅是文学理论场域发生转换的一个局部,实际上文学理论场域对传统文学理论场域的悖离是深度性的整体的悖离。

首先,文学理论的本体蕴涵通过拓展传统理论语境而逐渐地独立出来。1980年代以来,关于文学本体蕴涵的多种名目,如“人类学本体论、生命本体论、活动本体论、艺术本体论和反映论本体论、意识形态本体论、理性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否定本体论”等^{[5](P161)},在各种提法中,“审美意识形态性”可以说是一直起着主导、控制性的官方提法。到了1990年代,这种提法开始向结合历史语境来阐释涵蕴转化。譬如,钱中文教授尝试从结合中国审美发生的历史语境来谈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性^[6]。童庆炳教授在《新中国文学理论》一书中,也明确认定文学本体蕴涵不应再只是围绕“社会生活”这一概念来打转转,他说:“在特定情势下,受不同的利益驱动和精神追求的影响,各种各样的文学观念大量涌现,因而,不同层次、不同集团的人对文学的看法发生很大的变化,同时对文学在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作出不同的安排。……既然对于文学的思想和理论表述已经离开社会生活的‘中心’,那么,在大体原则一致的条件下,就可以‘和而不同’了。”^{[7](P10)}这种宣称表明,尽管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仍然是文学理论本体的核心话语,但对它的阐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视界,开始在一种动摇和解构原来涵义意向中,向涵容不同性质的理论蕴涵转化。

这种转化的场域特征是,现代性问题被大量牵涉进来,与文学本体蕴涵的元逻辑思考交织一体,衍化为文学理论新体系的逻辑基础。现代性与后现代还不是一回事,但在现代性中,包裹着后现代的思想萌芽。譬如“文学性”问题,就包括了结构主义、形式主义、存在主义等文学理论流派解构“泛意识形态性”以维护文学自律性的内容。其中,涉及到文学系统的深层结构与模式,则重新召唤“陌生化”与“自动化”概念,强调文学的诗意价值与自主性,都向文学个体化存在形态倾斜。而现代性对传统以经典论断“先在性”的反感,从和现代性批判对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意识、整体强制观念的颠覆意图,表现得尤为鲜明,从而不仅使文学

理论真正进入了当代人生、文化所面临的困惑和矛盾,而且透过现代性的对文学的文化、哲学、美学、历史、语言学、伦理学的穿插思考,使文学本体蕴涵不断绽现出新的概念和命题,像主体性、交互主体性、主体间性、客体肌理——结构、所指、能指、复制、大众化、日常生活、语象、语境化、文本、本文、多元化等等,都是在上个世纪后半叶涌现出的新概念。由于这些新概念的绽出,使得文学本质的思考场域被空前拓展,并且在整体理论指向上也由普遍原则的讨论向文学存在身份和话语呈现特征、权力方面转换。对此,我们可以这样概括说,通过文学现代性的理论拓展,文学研究理论场域进入了属于文学自身学科化建设的阶段,而这是传统理论场域及其话语平台所不能容忍和想象的。

二、“凸镜”与“凹镜”:文学理论涵蕴的爆显

理论涵蕴的“爆显”是文学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它指文学理论的话语空前繁富,各种理论蕴涵的信息簇相联结,往往由一个信息簇核心过渡到另一个信息簇核心。在中国文学理论近三十多年的发展中,不论是古典文论、现代文论,还是后现代文论,都经过了话语阐释多层次的、各种方法论的过滤、熔铸和转换,可以说,这是文学理论场域最为开放、也最为活跃的一个时代。

那么,呈现于当代文学理论地域中的话语形态是否存在跨越不同视界的主脉?如果存在的话,它与后现代视域联结的现实依据是什么?其理论突进的贡献又是什么?对此,我们通过当代文学理论实际境况的考察,可以形成明确的判断。总体而言,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形态有两条主脉:一条是以意识形态意涵的扩张促成的文学涵义由经典跨越到后现代视界,进而形成了宏观势态的多元化涵义研究格局;另一条是以文学自律性的研究聚焦所实现的文学内部涵义的话语增殖。对于前一种,我们用“凸镜”来形容其信息外张的状况,后一种则用“凹镜”来形容涵义向内聚拢、集中的状况。

文学涵义的“凸镜”呈显,是文学涵义突破政治意识形态的单一、普遍性意涵之后,由确立后结构涵义性质的意识形态本体涵义,过渡到具有现代性矛盾张力与内核爆裂的意识形态涵义扩散,

再进而拓展到非中心的意识形态化涵义讨论。

(一)本体论涵义的意识形态化阐释

传统视界的文学涵义限于单纯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论思想,而将意识形态理解为绝对化的、权威化的理论范式。针对传统视界的封闭、单一所造成的文学涵义与现实生活特别是人的真实境遇相脱离的境况,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其中将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学涵义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实践本体论结合起来,构建以存在论为核心的文学本体涵义观,完成了文学涵义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中国化的理论拓展。有学者指出:“海德格尔正是以‘此在’之‘在一世界—中—存在’(In-der-Welt-sein)为切入点,以‘艺术作品’(Kunstwerk)和‘真理’(Wahrheit)为桥梁,以一种完全非形而上学化的话语系统言说‘存在’,也由此营创出了现代哲学的新天地。……马克思则实际上肯定了人的实践活动否认逻辑优先性和基础性(并非时间上的先在性)。借助于这种优先性和基础性,人建立起了自身在存在论领域内的主体性(康德建立起了认识论领域内人的主体性),一切存在问题只有在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人的生存活动中才能以正当的方式被提出和被思考。”^[8](P101-111)]马克思主义存在论也是意识形态性质的涵义“先在性”设定,将海德格尔存在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美学原则联结起来,在逻辑上就实现了把抽象的意识形态化的“人”向“现存世界”的、具体的人的转换。提出这一主张的学者,在与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海德格尔存在论结合起来的主张者对话时,进一步明确说:“对实践概念的这种理解来自马克思的原著,并不是笔者的任意解释。这是笔者提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前提和依据之一。”^[9](P91)]对“实践”、“存在”涵义的讨论,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现代美学本体涵义的联结,“实践存在论”的提法符合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化语境,它强调了文学审美以人的实践存在为本体^①,这对于建立文学涵义上“人”——“世界”——“艺

术”的本体论统一是十分重要的。

本体涵义的意识形态化阐释,在实际操作时必然面对是澄清误解还是超越原有观念的矛盾。保守的本体涵义阐释,经常表现为唯经典主义和教条主义,表面看似恪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学和文学的基本原则,但实际上经典涵义即便作为逻辑意义的“先在性”基础,也是在阐释中完成的,即经典涵义若不能做到阐释语境的引入当下,便不可能凸现经典涵义的逻辑真值。至于对经典涵义的拓展性阐释,乃是将经典涵义的内涵和外延应对当下的语境,有其现实的涵义对象“场域”,从而才使经典涵义变得较之原经典文本所阐释的蕴涵更为丰富,这些丰富了的观念、命题乃至体系,即便与经典原本中的涵义似有所脱节,它也是受经典涵义的启发后与当下语境、对象因素触遇的结果,其基本精神仍然符合经典涵义的意识形态性质。当代文学理论的涵义研究,要坚持一种体现当代人性本真与现实性真值的意识形态观,避免那种割裂人的现实性而单纯进行的玄学式乌托邦涵义思辨,譬如所谓后实践的自由观、生命观,表面看似在倡导当代人生的价值真义,但实际上精神实践并不等于社会实践,抽象的价值超越并不能充分呈显人的存在性与现实性。意识形态涵义的存在性与现实性并不矛盾,当代学者也有提倡文学的本体涵义是非意识形态性的观点,这种主张中有的将文学存在从意识形态语境独立出来,倡导一种文学审美性超越人的现实性、存在性的涵义真值。但我们很难设想有这样的文学真值存在,因为文学的涵义真值并非封闭系统的文学自体所给予的,它必然地要与社会、文化及其他的媒质产生信息碰撞。文学涵义是诸种信息形成碰撞、汇流性“场域”后,由话语规则所择定的一种意义函数。在文学涵义的信息源与在场变量和最终的涵义择定之间,存在着多种阐释可能,正是这种阐释的可能性使我们在逻辑上可以把文学的自律性话语表达独立出来,认可其话语涵义的真值在

^①经典作家的理论研究必然有自己的阐释。像马尔库塞就曾提出“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Heideggerian Marxism, by Herbert Marcus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5.),认为海德格尔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反对工业社会的技术进步及其具体化而实现的社会革命,由于马克思对于对象性有深刻的阐述,对主体性,即人的存在有所忽略,从而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主义能够形成互补。马尔库塞的“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显示了激进的社会批判意识,显然包含着浓郁的阐释成份,但他的观念是应对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而“实践存在论”则体现了尊重人的存在论基础与优先性的问题,这对于将文学中的人置于宽泛的、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化的人的理解,显然具有理论意涵穿越到当代的意义和价值。

场,也可以把非中心的文学涵义信息视为非意识形态化的存在,但意识形态化的涵义始终是文学涵义的一个在场性主脉,是文学理论无法回避的一个“场域”。意识形态化阐释,一般以集中表达社会的权力理念为其真值,在现代化境遇中,这种真值因理性范式的僵硬和独断,越来越暴露出很多的问题。而在后现代语境下,意识形态化的阐释便由传统社会(也包括现代性的权力理念)开始向社会大众和普通人的生存意愿转移,从而后现代境遇下的意识形态涵义阐释,在价值真值的提出方式上,便有可能与传统视界和现代视界明显悖离。如有的学者提出“生态存在论”的本体涵义观,认为“人的现代性归根结底是人的生存层次的提升”。“只有文学及其所蕴涵的美学精神……才使人的存在成为诗意的存在。”^[10](P220-224)]这种观点就其逻辑真值看,是否定人类中心论,是将现代性作为反思的内容,以自然对人的生态学意义为基旨,主张文学与自然、世界的生存(存在)价值的平衡和统一观念,其内涵对文学的影响是促成由现代性到后现代境遇的理论拓展。“生态存在论”涵义着眼的依然是人的生存和存在问题,它消解了意识形态的僵硬主体性,表达了后现代境遇下的现实性和存在性宏观意愿,可以说是一种后现代方式表达的意识形态涵义在场。

(二)意识形态化的话语增殖

把意识形态问题,透过历史语境和现实语境,向人的现实生存、心理以及所遭遇的生存阻抗等方面掘进,便使文学涵义的意识形态问题由宏观性观念思考转化为纠结着诸多现实性内在矛盾的话语表达,特别是在网络普及、全球化传播、欲望与暴力被各种符号演绎、文学审美日常生活化等问题被提出和关注之时,过去以体制性意识形态为权威观念并由此设定涵义界限的情况,就自然而然地趋于化解了。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表达,借助信息化、商业化、市场化的无所不在,呈现为话语性“场域”及其相应“效力”的真值判定。

“场域”即在场性及其范围。文学涵义的场域,是一种理论场域。曾一度存在的政治场域或体制性意识形态场域使文学涵义基于社会认知而得到定义和解释,而后随着文学自律意识的觉醒形成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符号性”等涵义阐释,也是基于普遍本质的“先在性”而被赋值

的。因此虽然这些概念很具体,但不能说拥有文学涵义的话语表达场域。“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所有这些阐释文学性的途径和线索都逐渐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后现代文化对现象与本质、感性与理性、逻辑与隐喻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背反恢复了文学的诗性之维。文学既不是道德情感表现的工具,也不是与现实世界全然无关的符号体系。在功能问题上,文学艺术高举感性冲动的大旗,坚决反对康德以来的‘审美无关功利’说,解构着艺术与现实、审美与功利的界线,不断向感性、向商业性靠近与融合降解。种种迹象表明,传统文学性概念的各种界定方式和阐释途径都陷入了一种悖谬性的境地之中。重释文学性,重建文学理论的话语系统,已经成为当代文艺学最为紧迫的理论使命。”^[11](P130)]于悖谬处境中“重释文学性”,表明现代性症候凸显于文学涵义话语的不同方面,从而促成话语涵义的“场域”大大突破以往权威性“话语”场域。在这种文学涵义话语“场域”的扩张中,意识形态涵义的话语扩张仍然是强有力的一个“场”。一方面,人们不再简单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涵义的权威性与合法性,对执守经义是否“纯粹”,是否合乎“原旨”,至多视为“一家之论”而容许其发言存在,另一方面,对“解构”性主张也持宽容态度,就像黑格尔所说的否定因自“他者”向“自身”的转化,“解构”也是涵义发展的辩证轨迹。由于意识形态话语“场域”实质性地形成,便使文学涵义获得从未有过的涵义增殖。而在话语“在场”及其增殖过程中,也逼迫大量原来的含义连同其表述退场。例如,关于文学与欲望的关系,先前多倾向于将欲望视为非精神性而予否定,后来汲取叔本华、弗洛伊德理论到意识形态化的话语诠释,欲望就成为升华的本体对象和内容。在其他概念上也存在类似情形,如在拉康、阿尔杜塞理论被引入以后,“镜像”、“想象性虚构”等概念,便造成马克思主义文学涵义由主流形态到非主流形态的进一步扩张。福柯、德里达、桑塔格、洛奇等的文学涵义观念,进一步凸显了文学涵义的意识形态特征,使文学意识形态的社会性与价值感获得了感性生存域的趋势支撑,并在导入全球化境遇中实现文学涵义的话语真值抉择。

“效力”问题是文学涵义的现实性与价值性如何趋于同一性的问题。理论的效力不是行政效力,

它不为现实的文学提供操作法则,理论的效力是对文学在场性的一种解蔽。换句话说,把原本没有说的或说不出的变得说出或可说,就是理论效力的一种现时性发挥。涵义效力居于文学话语的中心地位。文学涵义的拓展唯有从底部,从人的生存、人的欲望底部着眼,将之导入意识形态的大场域,使欲望与现实产生的各种碰撞在价值观的解析中得到合理的流向,才是文学涵义意识形态性的所在。在文明与罪恶、历史与反动、建构与建构之间,话语增殖暴露出涵义的深层矛盾。暴露是一个前提,在暴露的基础上使涵义导向价值之域,则是一个更根本的规则。譬如拉康,他对镜像的理解,不断析出新义,每一次新义都对旧义形成颠覆。但在拉康的“幻象”否定中,对生命中遭遇压抑的本质东西始终关注其升华的合理性,从而拉康的话语增殖在立体生成中具有其总体流向的明确。否则,单纯升华欲望是危险的,因为“任何对动物性的升华企图都导致差异性的爆显,潜在地胁迫着由压抑之所返归到带有力量和权力症候的结构。”^{[12](P90)}中国文学涵义的话语增殖也是这样,随着现代性话题逐渐迁转到后现代消费语境,颠覆意图必然在各种矛盾意向重重交锋中空前铺开,而此时意识形态性的“颠覆”指向,还应该是文学自律性价值与总体文化性价值的同一,否则任何单纯立足于欲望的“后结构”构建的主张,都会带来对文学潜在的胁迫与伤害。

为此,我们有必要就涵义拓展到非意识形态性的情形有所考察。作为“凹镜”的文学涵义拓展,立足于文学独立性的“先在性”(Prori)问题思考,在跨越到新世纪之后,以“图像涵义”、“叙事涵义”、“意象涵义”的思辨与解析,构成从现代性跨越到后现代场域的重点。

图像涵义研究是近年来文学涵义研究的一个重点,据相关统计,2001年以来“像”与“象”在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很高,“对图像的关注几乎是爆发性的增长”^[13]。图像原为绘画领域概念,引入文学研究领域涉及图文关系及文学图像的涵义问题。对于图文关系,近来学界的最新成果认为图文关系反映着诗画关系,两者存在着“互仿性”,而就“互仿效果而言,却存在非对称性态势:图像模仿语言是二者互仿的‘顺势’,语言模仿图像则表现为‘逆势’。”^[14]语言符号的“实指”和图像符号的

“虚指”性质,决定了在实际文本中语言处于强势地位,“当二者共享同一个文本,就有可能导致语言对图像的解构和驱逐,或者延宕和遗忘。”^{[14](P171)}这是就图像植入文本后造成的涵义效果而言的。文学在消费社会与图像的广泛结缘,是意义的一种弱化和淡化。根据该最新成果的观点,图文关系中图像处于弱势地位,并不能撼动文学自身的涵义表达,反而消解着图像涵义,“崇文抑图”是符号本身涵义表达的一种客观化效果,那么在文本中植入图像,在增强阅读可感性的同时,并不会影响文学自身的表现力。现代性符号理性与后现代“读图”感悟形成文本的涵义交叉,是一种值得深思的现象。而另一种情况是,文学图像概念特指深入文字内层的涵义图像,当文学在电子时代与各种空间形成互动关系时,“看不见”因素在文本内的“看见”,就成为文学涵义的一个新主题。城市生活在视觉接受基础上生成复杂多变的空间结构,这些结构不仅使可能性和现实性变成具有活力的物化、可视性元素,而且使人内心世界的幻想、臆想及欲望的繁多表象和变态想像都成为文学内在涵义的构成因素。一旦文学涵义造成实质性地向图像(或可以借助视觉媒体转化为真实图像)转化,则现实性的文学涵义解构就由过去的实指性文学言语向虚指性的、带有意识形态欺骗性的图像性言语的形态转化,其结果是造成文学意义的整体消减,有学者称这是一种“图像霸权”或“欲望消费化”^{[15](P30)}态势。我们以为,文学图像涵义由传统的图文各体到现代的互仿共享,再到图像性言语的活化生成,反映了文学由传统的独立自成向非独立生成的转变,在转变中文学涵义通过图像的言语化和文本言语的图像化,使文学涵义呈现与外部空间立体化的对接,并将人的内在世界通过言语图像的可视化,生成为可以与外部空间对流的活性因素,这是文学后现代生长性的一种体现。各种现实、文化理解均可以进入文学图像涵义。笔者曾就佛教涵义的图像化呈显思考过这个问题,认为“从当代眼光看,佛教美学的生活图像充满了思维的拟设色彩,这种拟设使我们既感觉到虚幻不真,又从其对虚幻不真的否定中体味到对生命本真的尊重。”^{[16](P230)}问题在于,文学图像的言语视觉化最终是否由文学性言语所制约,目前鉴于外部媒介的图像化强力干扰,我们尚存有许多疑问和

担忧,不少文章也因此缘故批判图像的暴力性泛滥,但我们认为只要是文学言语完成的,就必然能够确保文本形态的文学涵义性质,这反过来其实也是对一切其他形式化(视觉化、听觉化)构成的一种统摄。未来文学涵义的图像化呈显,可能将展示这样一种潜在的趋势和本质。正如福柯所言:“因为现在我们不再拥有那种原始的、绝对初始的言语,语词基于话语的无限运动而建立并受制于它;从此以后,语言的增长没有起点和终点,也没有承诺,它在文学文本日复一日的轨迹中所形成的基本空间中成就着这一意义幻化的往返穿越。”^{[17](P49)}

叙事涵义的转换与拓展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已经成为文学话语自律研究的主战场之一。从最初介入文体和形式的“元叙述”、“文体叙述策略”研究,将“作者的叙事”转化到“文本的叙事”^①,到自觉运用西方叙事理论进行中国叙事研究^②,体现了对叙事涵义的纵深掘进,而本世纪以来关于“新叙事学”的研究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有学者在总结这方面的进展时指出,中国的新叙事学追求多种方式和多种模式的复数形式“narratologies”的探讨,“将研究对象从诉诸语言文字的笔头叙事与口头叙事,扩大到了镜头叙事以及诉诸其他新兴媒介的叙事,甚至超越了文学叙事的范围进入历史叙事或其他叙事”^{[18](P4)},从而在他的研究中如何将文本的不确定叙事与可能叙事,在电脑世界里充分发挥出来,使“虚拟”、“递归”、“窗口”、“变形”这些富有意义的手段用于“电子文本”的叙事,让文学叙事走出文学,实现历史叙事与虚构叙事的创新,不仅充分汲取了本文后现代叙事的有益观点,而且对于维护中国文学叙事的未来生长性,打破“当代艺术终结论”都是很好的推进。

意象、意境涵义思辨是涵义研究聚焦的又一重要区域。“意象”、“意境”作为中国文学的传统概念,在不同时期都有大量的专论。后现代视阈下对“意象”、“语境”涵义的讨论,体现了比较复杂的情形。一方面,本土文学涵义生成的基础,其理论渊源是属于本土的,不能从西方或现代的文化基础

来厘定传统文学范畴的涵义;另一方面,传统文论范畴要用之于当代,就必须对其涵义有切合当下的阐释,这就面临着如何由传统至现代、后现代乃至中西涵义融合的问题。针对学界有人提出“意境现代化”和“意境世界化”^{[19](P42)}的主张,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意象、意境范畴的“建构本身,起决定意义的,是当下、本土文化现实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作为民族性、时代性极强的范畴,要找到其“现代化”和“世界化”的本体是很难的,因为它本质上是本土的、传统的。但传统文学范畴的涵义与现代涵义具有文脉发展意义上的联系,如:“意象之心理氛围偏于实有,意境则偏于无、空,意象之美实笃而意境之美空灵。”^{[20](P34)}这一观点主张“意象”本质上源于《周易》的“意”、“象”理论,而“意境”更多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近年来,也有学者将“意象”、“意境”范畴纳入当代文学理论体系结构,有的学者甚至将“言”、“象”、“意”关系作为文学形象系统生成的逻辑核心,都不失为很好的探索,但这些探讨似乎很难把现代性的复杂意向统摄进来。但我们注意到,也有颇具新意的、将西方现代美学与传统美学吸纳于当前文学元命题涵义研究的提法,如将“块垒”视为文学涵义的本体,认为“由块垒引发灵感,进而由灵感产生出富有生命力的核心审美意象”^{[21](P282)}，“块垒”涵义凝合中国古代的“情志说”、“不平则鸣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马克思的“激情本体论”等,在确立当代中国式文学本体涵义,特别是文学审美意象涵义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

总之,在后现代视阈下,由宏观意识形态层面和微观文学自律层面展开的涵义研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与外延,使中国文学涵义的构成足以在核心涵义和重要构成环节上形成自足的、有别于西方的观念体系。但同时也要指出,在这些探讨中,有些基于西方现代、后现代认识论出发而形成的涵义认识,还没有达到能够充分、全面地回应当下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国文学涵义问题,特别是后现代文学涵义的阐释与理解,还停留在相对表层的“解构性”理解与知识特征的一般概括

①陶东风的《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汲取了大量后现代的学术思想研究叙述的本体语义及其规律,并结合“先锋小说”的实验性叙述进行了细致集中的文本分析。

②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对中国叙事的结构、表述视角和存在形态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分析。

方面,这就需要对文学的后现代涵义的一些根本问题,给予正面的讨论,以形成清晰和确当的认识。

三、后现代涵义:本体与方法

文学涵义无法摆脱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和牵制,一个是宏观的逻辑层面,因为宏观“先在性”的涵义赋值,往往是文学存在所不能回避的。文学总是处于时代和文化的宏观逻辑支配之中。另一个因素是文学事实,经验主义的创作与批评为文学提供涵义启示,实际的涵义研究必然以当下文学事实为对象性客体基础,惟其如此,它才能超越当下文学事实形成涵义的规则和阐释系统。

步入后现代语境之后,文学涵义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文学在后现代“场域”之中的涵义认知所面临的问题,不再是现代性“场域”的后现代视阈性涵义选择、过滤和拓展,而是要直接在后现代境遇、语境中解决诸个别问题。那么,中国文学涵义从怎样的途径着手,才能更好地解决文学涵义的未来拓展问题呢?

首先,最重要的问题是文学本体涵义的问题。现代涵义本体保持了理性反思与批判的逻辑统一性。现代涵义在揭示诸种矛盾症候时,清理了虚假的意识形态限定,使文学涵义向人的本真存在靠拢,其对文学自律性的话语阐发,充分展示了话语增殖的活力。在后现代境遇下,这一切却将面临新的质疑,因为人的存在及文学话语的涵义增殖,在后现代本体论理解中并不具有形上规定的统一性与连续性,它更追求断裂、界限、个体化、变化、延异、区别和差异,它在追求取消“先在性”的过程中实现碎片化(fragmentary)现实的多样呈现。这样,传统文学理论对文学涵义的真值判定就面临着被否定。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迄今人们对后现代的混乱状况难置可否,因为碎片化似乎在暗示存在透明性的同时,也暗示了无序与无根的状况。但实际上,后现代作为一种思想和文化,最终还是要归依于涵义的规则秩序的,即是说,后现代对于碎片化事实的涵义认知,与其按照后现代的涵义认知逻辑,寻找符合后现代涵义本质的本体描述,在根本逻辑上是超越“碎片化”境遇的。也因此故,目前西方涵义学中的后结构语义学倾向颇为流行,通过后结构的本体论奠基,后现代语义将现代性的

矛盾性症候,连同对其解构实现的“碎片化”症候,一起予以逻辑上的根治,在一种似乎涵义逆转的思考中赋予后现代涵义以价值真值,使间断性分化个体得到自在的呈现,这时的涵义系统不再以对现代性矛盾、悖谬的理性“铜补”为其特征,而是以涵义为阐释中介推动着文学多样化存在与知识形态的形成。

因此,可以确认,“碎片化”状态有其可支撑自身存在的本体涵义。从根本性质上说,这种本体涵义的逻辑是一种“多”。惟有“多”才成其分散与边缘化存在。对“多”的逻辑描述,即后现代本体涵义的逻辑阐释。体现在文学涵义方面,它表现为一种基于对象性事实存在的语言描述——“虚构性操作语言”的建构,卡尔纳普说:“正确的虚构因坚持把结构意图视为对象认知的理性重构而被选择。这种重构反映了对对象形式化的形式结构。”^{[22](P157)}卡尔纳普认为,对象性事实的涵义重构既有纯本体的自由性,也满足操作规则的直觉愿望。中国文学涵义的后现代重构从尊重消费社会条件下文学事实断裂、变异和碎片化事态出发,自觉将操作规则确立在直觉整合了古今中外文学资源的平台之上。这样,意识形态的宏观逻辑和文学自律的微观话语,在通过“中介性”涵义逻辑平台时,就形成现时性沟通和联结,并通过这种联结彻底否定理性的“先在性”,让直觉的差异性作为主导因素构成独特的存在论分延描述,于是,后现代涵义逻辑的“多”之本体,就实现了贯穿否定意识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多重时空的审美分延。

其次,后现代涵义拓展所面对的关键问题,是话语系统的逻辑分延如何保持其涵义真值的中国特性与全球化“场域”问题。前一个方面是涵义拓展的目的与效力的时间转换问题,如果不能保持中国特性,则涵义之根势必依托于西方文学理论的基础,形成涵义的殖民化移植。而中国本土文化自古形成的系统与西方后现代迥然有别,能否完成分延性质的涵义转换就要找到切合中国式分延的逻辑规则。在指向未来的逻辑假设中,这种逻辑规则是一个可能成立的命题。因为传统中国化思维的整体直觉,强调了相似性的连续,这种涵义认知遮蔽了中国文学涵义的否定、间断、个体化绵延的真实。譬如,意象、语象、境象和意境、境界等的涵义分延,并不在于有“意”或“象”的元素构成才

成其涵义扩展,恰恰是各自明晰的分界及本质的上差异造成了内涵与外延上的延展。依此,则事象、图像等具有后现代“标记”的概念,与传统的意象、意境概念一样具有分延的逻辑相关性。第二个方面的问题是涵义拓展的空间转换问题,就像前一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样,后一个问题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未来的文学涵义在古今中外的理论融合“场域”中呈现高密度的错落咬合,它会促成方方面面的涵义分延。可以推想的是,未来中国文学涵义的逻辑必然在全球化场域中秉持其个体独立性,并将中国的个体独立性贯彻为后现代文学涵义的精华,以真正实现中国式集合诸多差异性本质的文学话语审美系统。

最后,还要说明的问题,是指向未来的文学后现代涵义的逻辑深化问题。后现代的逻辑深化并不意味着一味的“解构”与“否定”,否定或解构的涵义拓展本质上是涵义的多皱褶展开和被遮蔽蕴含的直觉化自显。重构后现代逻辑的“中介性”阐释系统,并非以少驭多地重新确立某一单体概念,来统摄诸差异性存在,而是让“规则”成为理论操作法则,厘定涵义指向的分界与涵义分延的区隔性时空,这样就能保证有充分的可能性纳入操作规程,使逻辑深化也得到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以为后现代涵义对垒的方法,对深化逻辑特别有效力。目前,西方一些后现代理论家和作家都采用有涵义对垒方式。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将物理学和生态学涵义值入文学时,提炼出宇宙与晶体、轻盈与沉重、质量与速度的对立性概念,让它们在叙事中形成对垒,创作出了表达后现代文学涵义真值的新作品;英国小说家戴维·洛奇在小说中对人名、大学名称等用了对垒性质的语音或涵义,如“菲利普·史沃娄”(Swallow,英文有“燕子”或“吞咽”之意)与“莫里斯·耶·扎普”(“耶”有教名“耶和华”之意)的名字形成对垒,大学名“鲁米治”(Rummidge)的发音与“垃圾”(rubbish)的语音也形成潜在的对垒,把它们有效用于揭示后现代境

遇下大学教育的溃烂与知识精英的败落;德国作家黑塞在小说中将魔术和游戏、音乐与数学的对立意蕴植入小说设计,对直觉的极限之塔进行涵义颠覆,使形象、情节和符号的涵义对垒形成不同级差的深化,很好地强化文本的延异感。西方后现代理论家德里达、德鲁兹、齐泽克、鲍德里亚等都擅长运用涵义对垒的方法解决后现代涵义问题,因为他们所涉及的涵义“场域”非常大,从而各种问题的认知多与文学涵义形成穿插和渗透。譬如,鲍德里亚曾这样表达消费社会的涵义逻辑:“有两种基本的逻辑相互作用:一个是虚幻的逻辑,主要指向心理分析,其辨别、预测、超验的整个想象领域,在客体和环境层面上运作的权力和性,以及与房子/车子构成的轴心(内在/超验)相吻合的特权;另一个是有差异的社会逻辑原理,它是根据社会学来作出区分,而其本身是源于人类学(交往是作为符号、区分、地位和威信的产生)。”^{[23](P7)}在这段表述中,涵义对垒以虚幻逻辑和社会逻辑作为最高层面的对垒存在,它们的细化便是不同层面的逻辑、概念和符号运作,在层层展开中对立性涵义得以最大限度的呈显,从而达到涵义深层本质的揭示目的。涵义对垒可以作为承载后现代涵义分延的基本单位,单一的本体概念,在其逻辑封闭格局中巨细无遗地描述体中之义,难以展现涵义存在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本体涵义的综合外延,在逻辑格局上可以以“他者”之域呈现“此在”之“分有”,虽说也可以达到涵义的扩张与增殖效果,但对于否定性、虚幻性、断裂性涵义存在,则存在研究方法上的局限,因为不同系统中相似性的对接,毕竟允可的是存在体的分母基数,并没有指向特殊的本质实在。因此,必须进入到分延性质的涵义对垒层面,才能把不同个体显示出来,让不同个体的存在体充分呈显自身及相关性与连续性,以及基于分延所形成的连续性之转换。通过这样的涵义对垒方式,在一系列涉及文学理论的根本问题上,文学涵义指向未来的后现代拓展就有望成为可能。

参 考 文 献

- [1] 周宪.现代性视域中的当代美学问题[J].中国图书评论,2006,(7).
- [2] J. Alberto Coffa.The semantic tradition from Kant to Carnap[M]. Camb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 [3] 王岳川.后现代“文学性”消解的当代症候[J].湖南社会科学,2003,(6).
- [4] 赵宪章.文学和图像关系研究中的若干问题[J].江海学刊,2010,(1).
- [5] 钱中文,吴子林.新中国文学理论六十年[J].社会科学战线,2010,(4).
- [6] 钱中文.论文学审美意识形态的逻辑起点及其历史生成[J].文学评论,2007,(1).
- [7] 童庆炳,许明,顾祖钊.新中国文学理论50年[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 [8] 朱立元.海德格尔凸显了马克思实践观本有的存在论维度——与董学文等先生商榷之三[J].社会科学,2010,(2).
- [9] 朱立元.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概念——与董学文、陈诚先生商榷之一[J].上海大学学报,2009,(5).
- [10] 曾繁仁.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11] 曹顺庆,支宇.重释文学性——论文学性与文学理论的悖谬处境[J].湖南社会科学,2004,(1).
- [12] Erin Felicia Labbie.Lacan's Medievalism[M].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3] 赵毅衡,赵宪章,傅修延.叙事·符号·图像:当代文化景观三人谈[EB/OL].http://culture.ifeng.com/1/detail_2011_06/28/7298510_1.shtml.
- [14] 赵宪章.语图互仿的顺势与逆势——文学与图像关系新论[J].中国社会科学,2011,(3).
- [15] 王建成.图像的霸权与阐释的拯救[J].社会科学家,2010,(8).
- [16] 赵建军.佛教美学的生活图像[J].中州学刊,2009,(1).
- [17]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M].London:Routledge Press,2001.
- [18] 傅修延.继承与创新——新叙事学对文本研究的贡献(上)[J].创作评谭,2004,(2).
- [19] 古风.关于当前意境研究的几个问题——答王振复兼与叶朗、王文生商榷[J].复旦学报,2004,(5).
- [20] 王振复.对《意境探微》一书的四点意见[J].复旦学报,2004,(5).
- [21] 夏之放.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22] Rudolf Carnap.The 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World and Pseudoproblems in Philosophy [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9.
- [23] [英]柯林·戴维斯波德里亚:一个批判性读本[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Literary Theory Field in Postmodern Horizon ——A Discussion on Promoting the Studies of Literary Theory Connotation

ZHAO Jian-jun

(School of Humanit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e literary theory field in postmodern horizon highlights a breakthrough of the literary theoretical discourse in traditional horizon. Through an allegiance between breakthrough of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and new media, literary theory undergoes subversion in overall discourse forms. Firstly, the ide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terary theory realize discourse increments in fields of integration between authenticity and reality of modern humanity; secondly, in the field of non-ideological literary theory, the subversion of nature and constitutions in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has been completed through explorations of "image theory", "narrative theory" and "icon theory", etc. In short, the literary theory field in postmodern horizon has undergone shift from studies of modern theory symbolic to postmodern connotative. Such a shift focused on the studies of macro-logic and literary discourse and the studies of connotations of literary theory. It will further deepen and promote the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Key words: postmodern horizon; literary theory; connotation

(责任编辑:刘伙根 庄暨军)